

网络正在毁灭街头民营书店 鲍红呼吁:减税,减租,补贴,开放

■ 本报记者 刘霄

随着新技术的飞速发展,传统出版业正面临着网络社会的巨大挑战,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书店,中国民营书店则更甚。

在近日发布的《文化蓝皮书》中,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民营书店发展研究中心鲍红指出,在网络时代的民营书店困境中,针对书店衰落原因及民营实体书店的具体困境,建议免除所有实体书店的增值税,对部分公益性较强的书店进行房租补贴和项目补贴,降低图书销售门槛,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。

自1980年开放民营经济进入发行环节以来,民营批发零售网点发展迅速。据新闻出版总署《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》统计,2010年,民营批发零售网点达11.6万个,是国有的11倍多;民营批发零售从业人员47万余人,是国有的3.5倍;2010年,民营发行企业的总产出占整个发行企业的61.1%。但当前民营书店的生存环境却不断恶化。2012年,经典学术书店风入松、最大的社科连锁书店光合作用相继歇业,使民营书店的生存困境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。

鲍红分析,书店面临的困境是全球性的,但其根本原因在于,网络时代的来临,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,也改变了图书的经营模式。网络时代的数字阅读本来就使纸质图书的读者群不断减少;而纸质图书的读者,又越来越多地通过网上书店购买图书,实体书店的困境由此而来。

在鲍红看来,这个大趋势不可阻挡。在数字阅读和网上书店的冲击下,全球范围内实体书店的生存环境都在恶化,中国当然也不例外。即便新华书店自有物业并拥有教材发行优势,仍觉得经营压力很大,纷纷增加文具和电子产品的销售面积,以应对图书销售萎缩带来的压力。而且,我国近年来房租等经营成本的膨胀,让书店经营更加困难。高涨的房地产市场,造成一业兴旺百业衰。对于民营书店来说,房租更是成为书店的最大开支,占到利润的大半。不堪重负的书店纷纷转入地下室,或减少图书品种,增加艺术品销售以图生存。

在所有形态的书店中,民营实体书店的生存最为艰难。与新华书店相比,虽然民营书店面临网络时代的冲击是一样的,但两者拥有的资源却有天壤之别。两者在资源与起点上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状态。网络书店与实体书店相比,二者在商业模式上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状态。

这里所指的网络书店,主要是当当、亚马逊、京东这样的大型网上书店。应当承认,网络书店确实符合现代发展的潮流,为读者提供了许多方便。但是,网络书店可以拿着融资来的钱,通过超低价折扣扩大份额,敢于现在赔钱买来,而实体书店是靠现实的盈利生存的,两者的商业模式是不对等的。

网络书店过低的折扣对于整个实体书店冲击很大,许多读者将实体店书店当成了网上书店的样子。而家庭较薄的民营实体书店,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。

“实体书店要与网上书店公平竞争,政策方面可以作的是规范价格和折扣,避免网上书店的恶性价格战。”鲍红说,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我国图书定价一直是逐步放开的趋势,限价不太可行。在这个打折盛行的商业环境中,前几年推行的旨在规范图书折扣的《图书公平交易规则》也不了了之。

本来,出版企业也可以有所作为,比如限制自己图书的销售折扣,或通过法律手段防止低价倾销。但是,由于网上书店的份额越来越大,及其回款有保证,加之实体书店的种种不足,出版商既无动力也无能力来对抗网上书店。一般出版企业虽恨其折扣太狠,但对网上书店的依赖却越来越强。

“因此,我们只能正视现实,寻求其他可能有效的解决办法,比如呼吁政府从文化价值的角度给予书店一定的扶持,不只是对民营书店的扶持,而是对所有书店的扶持,民营书店同享一下国民待遇。”鲍红提出,扶持书店,应该免除所有实体书店的增值税,对部分公益性较强的书店进行房租补贴和项目补贴,降低图书销售门槛,并尽量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。此外,还应明确限制网上书店的低价倾销,保证实体书店与网上书店公平竞争。

何建明谈网络垃圾、国家叙述和免贴封条

管管网络文学

今年“两会”期间,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何建明提出,要建立健康的网络文学环境。相比传统文学,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,网络文学都可谓“后生可畏”。他何以关注到网络文学?

读书报:您了解的网络文学是怎样的状况?

何建明:经过十几年的发展,我国已经有5000余家文学网网站,而在网络上发表或连载的小说有数万部、数十亿字之多。我了解的情况是,目前网络文学每家网站都有稳定的作者群,网络文学的读者数量已超过纸质书刊,在某些知名网站上,网络文学作品的点击量动辄几百万次,有的甚至能突破千万次。

网络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但是网络文学作品良莠不齐,“妖魔化”现象严重、价值导向时有偏颇,问题不少。具体而言,目前的网络文学数量庞大、好作品少,大量的所谓作品是“复制品”,内容重复,相互抄袭现象十分普遍。很多作家或写作者出于功利性考虑,根本不考虑作品的质量、思想深度、艺术内涵,一味地迎合市场,什么火、什么赚钱就写什么。这样的作品基本没有多少营养价值,只是粗劣的文化快餐。

读书报: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“妖魔化”现象?

何建明:很多网络作家既不注重文学修养的提高,也不专注于作品内容本身,而是玩“眼球文学”,用暴力、色情、隐私、美女等描写造成读者的“轰动”,各种“鱼目混珠”“妖魔鬼怪”的垃圾东西充斥着网络文学。许多家长对此很担忧,说孩子们通过阅读网络上的所谓文学作品,接受的是有毒的精神垃圾。

除此之外,现在很多网络文学作品社会责任感缺失,大多沉溺于宫廷争斗、男女情感、武侠小说等。我承认,这也是一种文学表现,但是这些作品本身的价值及思想深度都有限,反映人民生活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东西少之又少。

读书报:网络文学如此现象说明了什么?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吗?

何建明:网络文学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巨大,缺乏深刻和健康精神价值的追求,必然会使网络文学陷入发展误区。我感到,是时候积极引导网络文学健康发展了。我们可以成立网络文学管理服务机构对网站进行监管和指导,建立和健全网络文学规范法律;对网络作品的内容,各网站的编辑与内容审核要自律,制止为了访问量 and 点击量而不加审核盲目发文的行为,要明确禁止“复制品”等网络文学垃圾。

网络文学的现状与问题恰恰说明它有着极大的提高和发展空间。政府和社会要建立健康的网络文学环境,为其创造更好的平台。有关部门应该加以正确积极的引导,把网络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功利性、娱乐性加以区分,打击文学炒作,同时也要制定法律法规,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,加大对网络侵权的惩罚力度。

对学校、家长和社会而言,要让青少年正确认识网络文学作品,提高分辨网络文学作品精华与糟粕的能力。网络上的文学作品丰富多样,把握住了方向,就会比传统文学教育事半功倍,我们肩负的担子还很重。

平息“三牛风波”

作为写了三十多年的报告文学作家,何建明第一次如此零距离地“随网逐流”,是因为某地区级政府网站上发生的一条不起眼的“公示”,它让亿万网民和公众搅得忐忑不安。

读书报:《三牛风波》的写作是为了澄清网络上的质疑,这是你第一部关注网络声音的作品吗?这是否说明报告文学作家所关注的领域也与时俱进?你觉得网络声音对“三牛事件”的质疑反



何建明,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。

映了什么问题?

何建明:“三牛风波”确实是来自网络的声音,也是我第一次以网络上引发的作为写作对象。眼下网络事件非常混乱,随意性很大,需要正视影响,正面引导,这是报告文学应发挥特殊作用的新的着力点。通过报告文学的深度采访和记录,对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和化解疑惑大有好处。

《三牛风波》是2012年纪实文学中销量最好的一部作品。报告文学需要报告的对象,作品服务机构对网站进行监管和指导,建立和健全网络文学规范法律;对网络作品的内容,各网站的编辑与内容审核要自律,制止为了访问量 and 点击量而不加审核盲目发文的行为,要明确禁止“复制品”等网络文学垃圾。

网络文学的现状与问题恰恰说明它有着极大的提高和发展空间。政府和社会要建立健康的网络文学环境,为其创造更好的平台。有关部门应该加以正确积极的引导,把网络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功利性、娱乐性加以区分,打击文学炒作,同时也要制定法律法规,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,加大对网络侵权的惩罚力度。

对学校、家长和社会而言,要让青少年正确认识网络文学作品,提高分辨网络文学作品精华与糟粕的能力。网络上的文学作品丰富多样,把握住了方向,就会比传统文学教育事半功倍,我们肩负的担子还很重。

作为写了三十多年的报告文学作家,何建明第一次如此零距离地“随网逐流”,是因为某地区级政府网站上发生的一条不起眼的“公示”,它让亿万网民和公众搅得忐忑不安。

《国家》的“国家叙述”,“国家叙述”是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风格。以《国家》为题的“国家叙述”,是何建明创作风格的一次具有新的标志性意义的突破。紧凑而合理的结构是实现“国家叙述”的高度与全局的梁柱,语言与情节则是依傍在这些宏梁伟柱之间的砖瓦和混凝土。何建明的“国家叙述”由此走向“国际叙述”。

读书报:《国家2011·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》是对中国在利比亚的海外撤侨行动的长篇纪实,书写这一中国外交历史上最大的撤侨行动,您采访了50多位事件的亲历者,创作只用半年?写完《国家》,您有怎样的收获?

何建明:实际上写作只用了两个月,两本书总共用了半年。很多人不会相信,其实一个作家的写作快慢,与质量不见得成正比。尤其报告文学,作家一旦遇到重大事件,就应像士兵打仗一样,十年八年苦战和全力以赴瞬间夺取山头,目标是一样的。报告文学的文体决定了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、最真实的材料和最生动精彩的文字,把真相告诉公众。像《三牛风波》那样具有新闻性的事件,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写出来。《国家》也是这样。

读书报:我们都注意到,2012年您的两部作品中,《国家》获得的奖项和引起的关注度更高。

何建明:《三牛风波》关注的是新闻事件,是今天的社会转型时期容易出现的矛盾之一,发酵得快,被淹没得也快,可能瞬间变化、瞬间消失。在社会转型时期,每天都发生很多新的事件,网络、电视等各种多媒体都有记录,报告文学如何发挥特别的作用,进行深度表现?这一点需要研究。外交战线认为《国家》是60年来外交形象完整展示,新闻过去,但报告文学全面、立体地总结撤侨事件,其历史价值是永恒的。因为《国家》其实展示了十三亿中国人一直追求的那种强国梦想的一次完美实现。

网上文谈



栏目主持/采写:舒晋瑜

读书报:近年来你担任了很多重要职务,但是创作量并没有因此减少。大家只看到一部部厚重的作品,并不了解作者的艰辛。一般人似乎很难想象是怎样的劳动强度。

何建明:对我来说一切时间都是宝贵的,除了吃饭,几乎都在写作。前年写《忠诚与背叛》,夜里两三点钟起来,写到早晨七八点再去上班。现在一年中我们除了工作上班外,还有100多天节假日,我的创作成果几乎都是来自这些时间。我想一个人,只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工作,没有干不成的事。所以这样的工作强度不用怀疑,不只是何建明,任何作家付出一样的劳动和代价,也同样能够完成。我一直被时间赶着,从当年写《落泪是金》到现在正着手进行的报告文学,都是这么走过来的。

积极向上,避免“封条”

30年48本书,何建明似乎已经习惯了追赶时间,或者说,被时间催赶。他一直寻求安静的创作环境,能够喝着茶看窗外的日出日落,能够合理有效地安排属于自己的时间,可是,这些对他来说是一种奢望。何建明总觉得,不光自己的创作没有进入最佳状态,报告文学的整体状况与中国的发展也还不够匹配。

读书报:这样的状况影响到您的作品质量吗?

何建明:时间是决定我能否出大作品的关键,对作家来说时间比生命还重要。生命是有限的,作品是无限的。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大的发展,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变化,网络又提供给我们无限的空间,我们的创作环境又具备了

充足的阳光、空气和肥沃的土地,就看作家能否下工夫去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了!现在社会上不太满意我们的文学成果,不是社会没有创作资源,而是由于我们思想认识的高度不够,不敏感,跟不上时代飞速的步伐,流失了好多素材。作为时代的记录者,我们的使命,应该把最精彩的事件、人物记录下来。

我的报告文学创作在题材和处理上没有问题,这一点我非常自信,剩下的是才情、智慧和情怀。我希望自己在年富力强时,能写出更多大作品。可是我现在觉得很累,有些力不从心,每次作品都是被赶出来的。报告文学需要深入大量的调查,作品出来还要精益求精地修改,这种过程对我来说极少,尽管作品出版也产生了重要影响,但我自己认为还远远不够,就我个人而言,我的真正创作没有开始,至少没有进入最佳状态。

读书报:这几年报告文学创作也很繁荣,您认为报告文学的时代到来了吗?

何建明:我认为报告文学处在繁荣“过渡期”,现在许多报告文学作家面对好的题材,写了但是没能达到好效果,文体本身有待等待与创新;另外,也存在好作品没有被公众认识和阅读。报告文学好的时代应该具备上述三方面共同构筑才行。

任何文学的创作,特别是报告文学的创作是很辛苦的,今天的写作者不愿意吃苦,更多地希望一夜成名,报告文学不可能像小说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,网络作品中就基本没有报告文学。

读书报:作为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,您如何评价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?

何建明:我们在报告文学艺术创作上要突破、要提升,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艺术性是生命的两个方面,忽略哪一方面都不行。另外,报告文学的评论队伍不好,和创作队伍一样,人员少,水准低,不能有效指导报告文学的创作方向。

读书报:有很多读者评价: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,是可以拿来当小说读的。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?

何建明:正因为报告文学也是文学作品,基本特性是艺术感染力,才能引人入胜,身临其境,否则就失去了文学作品的本质。报告文学让人读来觉得像小说,说明在艺术上进入一种境界。在《国家》的写作中我采取了电影的叙述方式,令人惊心动魄,现在看作品达到了基本效果。

读书报:80年代之前,报告文学创作几乎是静态的;90年代之后,报告文学是动态式的,流动的、不确定的,比如房改、医改,思考的问题及如何把握,作品的立意及切入点,都需要作家高水平的把握。您的思考,是有全局性、前瞻性的,我觉得这也是与其他报告文学作家的不同之处。您在采写上不但有扎实的功底,还有相当的技巧。同样是反映问题,您的作品得到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的重视和欢迎,而有的作家的作品却被贴了上“封条”,为什么?

何建明:动态的报告文学,要求事件还没有结论时作家去写,对于是非的判断和对事件的真相的把握,是对作家能力的考验。

很多人用小说的题材,或小说的架构来进行纪实作品的叙述,这里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同时,也不能把社会非主流的、片面的东西作为报告文学的主流,不能把局部的、片面的狭隘替换整个社会的真实性,一个负责任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全面、客观、准确地反映事实,要透过现象看本质。我们的创作必须和这个时代吻合,要发现社会的主流价值。经典的作品,都是具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的。我写的农民问题更尖锐,但我用正面形象表达尖锐的问题。文学作品除了真人真事,要着重表现时代、表现人民积极向上的追求。这样就可以避免“封条”。